

重归劳动:乡村环境与社会治理 的同步实践

马 威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各地政府自上而下实施了农村环境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改造意愿和自身行动力被边缘化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突出了“劳动”的价值,认为融入了劳动的环境才能够从自然转向“景观”,使之更加宜居。依据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人与环境存在互为主体、彼此嵌入的关系,在人—劳动—景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以案例呈现乡村围绕环境问题从自觉到自为的行动过程,包括通过协会建设组织劳动激发村民参与热情;通过合作社建设搭建按劳分配机制保障村民劳有所得,使劳动参与可持续,环境治理以村民为主体,将政府、政策、农民、组织、景观等带入治理任务网络,各主体相互协商,实现良性互动,多方依托环境治理行动实现多元目标达成。提出通过劳动动员激发农民主体活动,使农村居民在改造工作中变“客体”为“主体”,变“边缘”为“中心”,搭建共治共享共建平台,在环境提升过程中实现人文与自然和谐相依,以劳动为纽带,发挥人作为生产力关键因素的价值,实现环境整治与社区治理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 劳动实践; 环境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 村庄组织; 行动者网络理论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2-0121-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环境整治投入力度,环境整体质量得到提升,污染问题总体得到扼制。但同时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模式,农户被边缘,村民主动性不强,村集体功能限于上传下达,集体动员能力下降^[1-5],环境治理精细度不足、长效化程度不够,农村景观“千村一面”“盆景化”等现象普遍存在^[6]。实质上这些现象也是村民“集体不作为”问题的表征,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如何发挥村民主动性,激发其参与热情,使环境整治与社区治理相互促进,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课题^[7]。

农村人居环境承载多重角色,既提供着生产资料,也提供着生活空间,伴随城乡融合进程不断推进,农村环境还成为城市居民寄托乡愁的物理载体,具有体验价值和情感价值,学者指出,空间治理不是技术运用,而是对高度差异化日常生活进行控制与管理,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敏感的空间治理过程”^[8],农村人居景观应该具备历史感与故事感,处处体现人一景一情相互照应,如果仅依托项目制方式进行整治必然无法呈现人与环境的充分呼应,割裂人文与景观的连接。

本文借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具体运用拉图尔“对称人类学”分析工具,基于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建立人—劳动—景观模型,在不剔除偶然性事件的情况下回答以下问题: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改造的动力机制如何建立?“劳动”作为关键要素在人对自然改造中扮演何种角色?村民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劳动”投入的可持续?本文案例选取大别山区某自然村的农村环境治理活动,历时性地描述以环境为中心的乡村治理脉络,从中提炼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要素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并提炼出可资借鉴的经验。

收稿日期:2022-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与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20BSH122)。

一、劳动:乡村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枢纽

1. 本体论视角中“环境中的行动者”

“村民参与农村环境建设”话题本质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人的能动性”;其二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在人类学“本体论转向”^[9]中得到讨论。人类学“本体论”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强调人的本体论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人类以实践活动形成“类存在”,具有了物质和社会关系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空间的创造性,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通过社会参与,以劳动方式改造自然,创造出体现人类能动价值的现实环境。

近年来唯物主义人类学在反思“文化相对论”同时推动着学科“本体论转向”,突出强调劳动的价值,学科从强调“观念”到重视“现实”,将“物质”研究带回到现实研究,人的劳动也成为关注焦点,Ortner 提出“积极行动人类学”探索人的“处境”如何形塑“实践”^[11],如何通过环境改造来呈现人的能动性;Cadena 的“万物政治”理论指出“物”一方面是人们感受世界的中介和桥梁,另一方面“物”也承载着人们的创造力,将人的价值付诸实现;比起观察,学者更加关注行动,倡导“创造条件”,使民族志材料在其他看不到的地方被“呈现”^[12]。

Ingold 将人作为“环境中的行动者”,深刻影响了景观改造的研究,他借鉴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提出了“栖居视角”^[13],人通过劳动获得沉浸在生活世界的居住体验,与周遭环境相互渗透,建造成为人的日常实践、充满意义的行动^[14]。朱晓阳依托“本体论转向”提出“地势”概念,认为地理、居住空间、记忆、历史、道德伦理等因素都透过“地志性”得以呈现,将物质的环境看作观念形态的呈现^[15],人与自然在实践层面彼此形成映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所浓缩的含义生动体现在“家园”概念之中,整合了“结构—能动”“自然—人文”“理性—情感”等多对二元关系的分析框架。

2. 关于实践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景观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景观建造与维系背后都能折射出复杂的人与物的关系网络,“对称人类学”是对人与物进行并行阐释的新的理论分支,适用于环境/景观为对象的研究。20 世纪 80—90 年代,巴黎学派在唯物主义“本体论”脉络上开创了“对称人类学”^[16],主张实体在行动网络之中逐渐“演成”^[17],Latour 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kteur—Netzwerk—Theorie, 英文为 Actor—Network—Theory, ANT)分析框架,基于实践立场侧重关注场景中的具体实践与因素间相互作用^[18]。

ANT 认为,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为角色地位不同而产生不同行动逻辑,行动者必须通过转译达到平衡才能使网络稳定,转译包含四个环节,也是该理论的四个关键概念,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

行动者依据各自角色与资源在网络框架内建立问题处理方式,利益维系并促发行动者动力,行动者根据自身利益在网络中实现定位;“征召”意味人类与非人类通过进一步互动消除“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围绕目标建立的良性关系,促进“异质性”网络不断趋于稳定且发挥功能作用;“动员”则指行动者基于各自角色的行动从而实现广义的对称性,这是行动者成为网络的关键步骤,行动者通过纳入“网络”的过程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必经之点”,每个主体都在网络配置中发挥作用,网络也持续更新,行动者将新功能进行吸纳并发挥特定作用,伴随着角色不断转换,网络的动态性也得以充分保障。

20 世纪 90 年代,Murdoch 将 ANT 框架带入农村发展领域,侧重关注农村旧有传统对于新的资源灵活兼容的发展模式,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9]。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承嘉则借用该视角提出中国场景下农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乡村发展朝向联结地方场所与外在资源来实现^[20],突出主体发展为中心的整合性。近年来,ANT 广泛应用于分析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开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等空间改造和建构领域,不再将城市—乡村、人—环境对立,而是以还原实践层面的方式去将涉及“环境”主题的各层次因素划归到网络分析之中,从而描述其因素间相互作用的路径。

3. 分析框架

ANT模型侧重关注结构,对于人们进行实践的具体过程关注不够,缺乏对劳动价值的凸显,人类学者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正。Paul立足于本体论认为,人类学需要重新将人的实践拉入到研究视野,探寻人与物的实际联系^[21]。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然物的人通过“劳动”创造性地在世界中“能动地、现实地复制自己”,个体也通过“劳动”结成社会关系成为“类存在”^[22]构成了真实意义的人类社会。人类学“本体论”在关于“生境”论述中突出“劳动”作为实践的价值,基于包括景观在内的产品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重视劳动实践,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超越自然/社会二分的手段,能动性地将自然物质与人文社会进行整合^[23]。

本研究结合案例回答如何运用“劳动”来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讨论:首先,“劳动”作为起始要素,考察环境治理启动过程中“劳动”实践的动员效用,村民通过“劳动”实践主动进入到行动网络;其次,“劳动”作为整合要素,考察环境治理过程“劳动”实践在多种资源链接方面的整合价值,村民凭借“劳动”投入稳定了网络核心,带动了资源持续导入;再次,“劳动”作为评估要素,考察环境治理结束后“劳动”实践在维系社区凝聚力方面的稳定价值,村民的“劳动”付出依托制度不断产出价值资产,维系着村民持续“劳动”的良性机制。

本文分析框架为“行动者—机制—环境”,着重关注“劳动”在改变人居环境中的核心价值以及考察劳动价值得以良性回馈的机制建设,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凭借“劳动”这一关键要素构建起动态的行动网络,各要素也在网络行动中得到价值赋予,最终体现为人居环境与社会治理得到同步提升。

二、从“旁观者”到“实干家”:白露村环境治理案例

1.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为切入实践建立有效途径……“使实践以具体、动态的形式展现在社会学面前”^[24],呈现以动态化方式不断建构、冲突、演进等过程。本文围绕“劳动”实践在村民参与行动中扮演的积极意义,通篇采用过程—事件方法,描述案例村环境整治过程,分析过程中村民“劳动”参与积极性如何被激发以及“劳动”如何进行价值转换的关键事件,提炼与“劳动”实践相关的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在呈现人与自然本体论关系中的价值。本文撰写采取“扩展个案法”在特殊中抽取一般,将围绕案例展开的背景因素拉入思考^[25],一方面考察案例事件在具体情境中呈现的逻辑脉络,另一方面探讨案例对于理论阐释方面的支撑价值,使村庄的微观个案能够回应宏观层面的治理问题。

本研究所选取村庄通过组织建设和合作社运营激发村民劳动投入热情,通过劳动动员与制度建设把农民从“旁观者”培养为“实干家”,村庄也从破败的“空心村”到获评全国首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村^[26]。期间,返乡精英、地方政府、社会企业等相继在环境建设中得到“动员”,征召进入网络并扮演角色,使该村“环境整治”呈现出足够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具备较好的分析价值。研究资料来源于调研组在该自然村开展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工作,团队在2019年、2021年、2022年多次入村,驻村前后时间约25天,访谈村“五老”协会负责人、村两委成员、村民理事会负责人、村民、生态合作社法人代表和会计、白露村所在镇相关领导、县住建部门相关领导和“沃途”乡建机构负责人、主要工程负责人等,累积访谈时长约50小时,主要成员还参与村庄微景观改造工作坊等活动,通过参与实践,积累了大量观察资料^①。

2. 政策背景与个案基本情况

(1)村庄概况。白露村地处大别山南麓,距离湖北省省会武汉市120千米,距离L县城22千米,行政区划归属湖北省H市L县S镇,1984年合并入行政村后,为霞埔村第八、九村民小组,村落面积141公顷,有泉眼1处,7口水塘,48株古树,树龄均在100年以上,最长树龄达460余年。村庄由山谷河流相夹,东、北、西三面环山,南临巴水支流上游。村内可耕地200亩左右,作物为水稻和红薯,山林800

① 本文访谈对象均已按照研究惯例进行了化名处理。

亩,林木资源丰富,拥有板栗等经济林木。村内有农户 98 户,约 450 人,村庄常住人口约占登记人口 1/2,60 余户 220 多人可以常年在村。

(2)环境治理的政策背景。21 世纪之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责任主体是村集体,环境治理与维护经费依靠村集体自筹,人力则依靠村民集体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迅速落后于工业,农村发展陷入困境,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落内部公共环境破败凋敝,同时积累了大量污染问题。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城市反哺农村”发展转向,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内容包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公共服务”^[27]。同年,建设部(现改为“住建部”)召开“全国村庄整治工作会议”,制订了“通过政府帮扶与农民自主参与相结合”的方案。2013 年,住建部启动了全国村庄规划试点工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以专项基金、信贷贷款等方式进入乡村服务于环境整治,集中解决污水、垃圾、处理,绿化、环保等问题^①,系列政策标志国家承担起农村环境公共品投入的责任(具体政策参见表 1)。可以看到,虽然政策一直倡导村集体要发挥主体作用,要搭建“治理”机制,但是在实践中,政府却在作为公共品的农村环境治理中扮演着主导角色。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采用 PPP 等融资模式吸引资金进入农村环境治理领域,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的实际主导者。

表 1 我国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内容
2006 年	中央政府首次提出新农村建设目标,目标之一是村容整洁,这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照与重视。
2008 年	国家实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 5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创建。
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落实“五位一体”的重大战略。
2018 年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要抓手,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2020 年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激发公众和市场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全民行动体系。
2021 年	国家相关部门编制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强调推动村庄环境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从全面推开向整体提升迈进、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政策制度。

治理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8],所以,政策始终强调要构建农村环境的治理机制,实现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现代化。但实际运行中,农村环境仍以“整治”为主,呈现间歇性、单项性、暂时性特点。政府角色占据主位,村集体配合资源入村呈现行政化^[29],集体动员力进一步弱化,资金分包出现多重委托代理使治理结构进一步失衡,农民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严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匮乏,这一切造成农村环境只能整治而无法治理。农民参与动机不强,积极性不足,参与渠道匮乏,治理组织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不仅村干部与村民双双客体化^[30],村民与环境也出现了双双客体化,村庄公共空间与民居不再融为一体,而是与村民生活割裂开来,公共空间也不再被村民所爱护珍惜,而成为承载生活垃圾、污水废水的客体。

3.“劳动”实践重塑人—自然的本体关系

本文根据调研资料将白露村环境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村庄卫生清洁阶段、美丽乡村建设阶段、乡村产业化运营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劳动”的“动员”效用阶段、“劳动”的资源整合阶段、“劳动”的价值转化阶段。

(1)劳动实践的“动员”效用。2007 年之前,白露村村集体组织涣散,集体资产为零,村民已经多年没有投入劳动进行村庄整修,村容村貌就如村民描述:“雨天泥巴路,晴天臭水塘,房屋年久失修,垃圾到处可见,牲畜粪便随意排放,一些农户还没有通电。”

2007 年 11 月,熊福海从 L 县政府退休回乡,希望发挥余热来改善村庄环境。熊福海联系村内“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医生”“老退伍军人”成立“五老协会”,制订章程中就重点包括了“改变村容村貌”,“五老协会”发起村集体议事会,熊福海通过思想工作转变村民态度,发掘动力。

① 2015 年底,会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信贷支持工作的通知》,为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绿化、村内道路提供长期低息政策性贷款支持。

“当时在塘前那块空地开了几次会,他们几个老的都讲了,讲这些年国家社会的变化还有村子的变化,我们也觉得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也想让村子变好。但我们提出来没有钱怎么搞,他们说没钱没有钱的干法,扫地不需要钱,家家都有扫把铲子,先从扫地开始干。”(访谈记录CXDCX210916)

“五老协会”成员带头清运垃圾,又吸引了村里其他老人和妇女加入,一个月左右时间把房前屋后垃圾清理干净。议事会上,村民积极性明显提高,一些妇女主动提出,村里水塘以前可以洗衣服,臭了这么多年,能不能大家一起去清淤。“五老协会”垫付了资金,请来挖机和抽水机,以水塘所在的九组为主,村民出工把水塘做了清淤,在武汉做生意的村民还捐资2万元在水塘边重新修建了石阶,安装了护栏。

村庄通过自组织开展集体动员,村民通过劳动陆续进入到环境整治的实践,他们以劳动付出将以往客体化村庄重新塑造成为互为主体的关系,拓展了对村庄空间的认知,尝试恢复与村庄既有情感纽带。村民在垃圾清理过程中又发现了水塘清淤的必要,引发了新一轮劳动投入,水塘清淤之后,这个早已被废弃的公共空间又开始活跃起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聚集闲聊的场地。

(2)劳动资源的整合价值。为了维护劳动成果,同时避免部分村民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五老协会”配合村党支部和村民小组制定“白露村村庄卫生清洁”长效规划,将村庄公共区域划片,按照就近原则分派给在村的各家各户每天进行清扫,不在村的农户缴纳一定费用作为公共卫生维护基金,“五老协会”负责卫生监督。他们每个月进行两次卫生检查,并在公示栏对检查结果进行公示。

“检查的结果我们公布在公示栏里头,哪一户最清洁,哪一户清洁,哪一户不清洁都体现出来。最清洁的贴红帖,清洁的贴蓝帖,不清洁的贴黄帖。人都要个脸面,每次被贴黄帖就不光彩,渐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做清洁卫生。”(访谈记录CXDHP210911)

白露村模式得到了L县委的重视。2012年年初,L县委宣传部派出电视台团队进行采录制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专题报道,《黄冈日报》派记者驻村调研并对白露村经验进行提炼总结。2013年在黄冈市政府相关部门配套资金支持下,白露村获得了1.3千米入村道路硬化和水污分流的资金支持。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的试点工作,2015年开始各地启动了“村民理事会”组建试点工作。白露村“五老协会”从成立到2014年也已经6年,需要依靠更年轻的自治组织来推动村庄发展。2015年,经过推选和投票,白露村成立了由11位理事构成的村民理事会,制定了理事会章程。

村民通过组织建设、持续合作与公共资产管理,极大提升了彼此信任的程度,社区社会资本显著提高。村民对于“公共空间”拓展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相较于其他村庄需要等经费、要资金的情况,白露村通常依靠成熟的群众动员机制进行解决。

“看到村部有篮球场,我们这边到村部还要跨条水溪,孩子去那边不方便,干脆就不等了,自己建起来,组织了十几个妇女、老人商量,向理事会、两个组长打了个申请,把村后面土包包挖了,平整后建了篮球场,器械也是平整了之后树起来,老人小孩现在都有地方逛。”(访谈记录CXDHP210911)

“投工投劳”已经成为白露村解决内部需求的主要路径,村民习惯通过自己组织劳动满足村庄需求,白露村依靠集体动员和行动实践形成了更加多元的组织结构,村民理事会成立后,白露村组织生产、提供服务、管理财务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能够调动内部资源合理转化、吸引外部资金,白露村开始向下一阶段迈进。

(3)“劳动”的价值转化阶段。人通过劳动激活了村落环境,人的价值投射进入自然成为景物的有机组成,白露村村容村貌改观后,房前屋后、道路水塘处处可亲,公共空间时时有人,而且,作为古村,白露村以往废弃的传统建筑也获得了焕发发生机的可能。到2016年,白露村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湖北省住建厅考察后表示,白露村有较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前期村庄内部开展的环境整治工作基础扎实,还拥有健全的组织基础,利于开展建设项目,因此获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到了2015年,垌子建设也搞了好几年了。2015年湖北省住建厅就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古

资源比较多,包括古树、古城墙、古庙、古民居。另外,这个小山村400来人,但我们出过三个进士,两个举人,40多个秀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本科以上的大学生有40多人,我们把这些向领导做了一些汇报,他们把我们的家谱也看了。再者就是我们以前打下的一些环境整治基础。看了以后,领导们觉得我们这个地方面积不是那么大,景观也不是那么理想,但主要看我们发动群众起了一些作用,所以把这个定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点。”(访谈记录CX DHP210911)

熊福海的叙述将白露村的人文、历史、景观、治理都串联起来。村落的景观资源与人文资源彼此映衬,融人于景,人景不分,人文体现于景观,而景观衬托了人文。熊福海特别指出村落通过动员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为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治理基础。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目标,要求各地农村“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31]。S镇政府牵头成立白露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小组,共同探讨白露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依托白露村治理结构,以建成美丽乡村为目标,将包括自然资源、景观在内的多主体纳入“行动者网络”之中,形成多方利益赋予,由此村民劳动价值获得呈现与转化。

2016年初,白露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所属行政村组织对外招标,在湖北省住建厅村镇协会的推荐下,湖北省沃途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途”)中标,承担白露村基础景观建设工程。“沃途”负责硬件景观设计,同时指导白露村党支部、理事会成立合作社。

美丽乡村如果只投入硬件,没有组织建设,村民肯定就是当“看客”,你不管怎么建,村民都觉得与自己无关,美丽乡村这个肯定也持续不下去,我们做过很多景观都是这样。必须要通过合作社方式把村民都拉进来,用参股的方法把村民利益都放在一起,村庄有收益,村民受益,这样才可持续。(访谈记录CXWF210912)

经商议,合作社采取了四种股权形式:现金、土地、闲置房屋、劳动力,并对土地、闲置房屋、劳动力的计算方法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在《白露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规定:“现金为5000元为一股,闲置房屋每年一平方8元,土地每年一亩地500元”^①。2016年10月9日,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共62户村民入股,共筹得股金96万元,其中现金共31.7万元。随着后续村民的不断加入,截至2019年,合作社股金已经达到210万元。合作社没有把低保户、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排除在外,相反,鼓励他们以劳动力、房屋等为股本入社,享受收益。

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项目主体部分完工,工程包括供水和供电基础设施建设,已有传统民居、自然景观改造升级,搭建系列人文景观,主要有家学展馆、白露书院、自然课堂、农耕展馆等,为开展乡村深度体验活动提供了空间。白露村村民集体劳动也通过合作社“章程”得到肯定和保障,“章程”规定劳动力划分为大工和小工,“大工每天200元,小工每天100元,在年终进行结算,其中40%计入股金,60%发放现金”(访谈记录CXWWH210917)。项目建设期间,村民参与建设投入了268个工,其中大工计121个,小工147个,大工主要是村里老木匠熊开继带着徒弟投入到原熊氏宗祠“种善堂”的木工修缮中,“种善堂”成为“家学馆”作为游学之用。一些景观路绿化、原村小学内部装修整改等由村民投工修缮,将平时闲置的劳动资源通过集体经济的方式进行激活,劳动者能够通过“劳动所得”维系劳动热情,也吸引村庄更多劳动者投入建设。

三、分析与讨论

1.“ANT”模型下的农村环境治理

ANT理论着重点在于“联结”,白露村环境治理成果始终体现出农村居民劳动成果,从“水塘清污”到“景观修缮”,村民通过投入劳动直观感受到实践成果,通过共同参与分享劳动成果又强化了集体认同,这种正面回馈推动白露村民始终将集体放到重要的位置,能够为集体长期发展考虑,进行村庄长远规划,规避村民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村庄社会资本。

① 白露村合作社将承包权定为12年,因为当时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12年到期,白露村合作社将时间定为12年避免违反国家土地政策。

“农村环境治理”并没有最终目标,景观伴随“必经之点”不断变化,环境治理始终都处于“转译”状态。ANT将时间纳入分析维度,认为社会特点在于持续地延展。白露村通过环境治理的“问题应对”不断地将“人”“组织”“自然”各种因素牵入网络之中,通过实践促进治理网络不断演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前,白露村并没有关注过人居环境,屋、树、山、水因为处于景观之外而破败不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提出后农村环境才成为了政策视角下的问题,政府配套资源调动乡村积极回应环境问题,行动者渐次入场。案例村庄通过村基层组织主动将“水塘”“道路”问题化,从而呼应了国家政策主题,带动资源导入,整洁的“自然环境”进一步转译为下一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基础,这一阶段的“必经之点”使省市相关部门、乡镇政府、企业等外在行动者得到动员,白露村历史资源被重新调动,白露村景观古色古香,文化氛围浓厚,呼应着游客对于村庄的期待和想象。图1和图2呈现了在两个阶段中,各主体为达成目标通过“必经之点”时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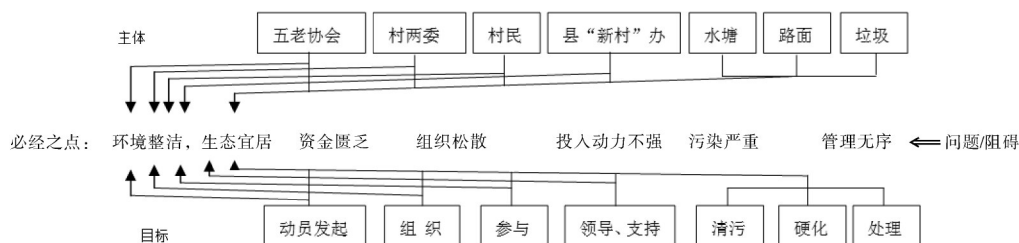


图1 第一阶段白露村环境治理的行动者与必经之点展示



图2 第二阶段白露村环境治理的行动者与必经之点展示

该案例体现出不断关联着的社会赋予了自然以生机,充分动员的基层社会能够使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得到可持续发展,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不断稳定提升,保障了未来建设的可持续性。

2. 组织化的劳动实践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要求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主体性”既是环境整治的动力,也是环境提升的力量,同时是环境维护的重要保障。税费改革以来,农民缺乏主体性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短板,学者在进行农村环境治理讨论过程中关注资源要素、资金要素、组织要素、制度要素,对于人本身要素关注并不充分,尤其较少讨论“劳动”本身的价值。

劳动是实践的重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再生产了自然”,与此同时,“劳动”不仅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联结,而且还实现了人与人的社会联结。劳动成为人向环境投射能动性价值的手段,人的意义在劳动中转化为环境的价值,自然只有蕴含了人的劳动才能够被称为“环境”,人通过劳动活化了自然,并通过合作实践形成反馈,建立起人与人的真实纽带^[32]。白露村案例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人需要“真实劳动”,需要在劳动中获得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整体发展历程中重视“劳动”价值,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真实劳动被资本切割,人的劳动被碎片化,劳动的意义被消解,劳动不再成为人改造世界的工具,反而造成了世界与人的分离,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特点是个体化,甚至将个体人作为一个个生产线上的环节,人们无法在整体劳动中寄托人的尊严。农村环境一方面包含着物质层面的改造提升,另一方面也是为村民提供家园感,让人通过家园的劳动建设实现

环境与人的重新有机整合,所以,人完整的劳动需要进行公共空间施展,公共空间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建构劳动与人的意义整合,沉淀富有价值的生产力。

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发起劳动的前提。劳动是一种行动力,个体发起行动会受到社会心理学“从众效应”影响,从而抑制行为发生。行动者组织化才能有效克服系统抑制,产生劳动的行动力效果。案例可见,白露村环境整治始终由组织建设进行引领,从非正式组织到正式组织,从社会组织到经济组织,这些“组织”激发劳动并且推动更多村民参与,扩大劳动参与范围和效果范围,“组织”对于个体劳动贡献进行记录,合作社组织还将行动者劳动进行价值经济转化,保障“劳有所得”,既激发了劳动参与的热情,也避免了其他村民搭便车的行为。与此同时,村民通过劳动继续使组织化持续成熟,通过共同劳动所营造的社区氛围降低沟通成本,增加彼此信任,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农村的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实现同步。所以,基层政府应该特别注意引导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基层自组织培育与建设方面,培养社区组织领导者,提供组织建设机会,给予组织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空间。

再次,组织规模适当。白露村作为自然村只有两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200 余人,村落有共同记忆,拥有宗族文化基础,地域范围肉眼可及,依托小集体而建设的组织能覆盖“半熟人”社会,正如奥尔森所说:“组织合作及其成本与集团规模大小密切相关,集团规模越大,达成一致性目标及展开集体行动越困难。”^[33]行政村级别的集体协商不容易主题聚焦,某村小组对于某一问题的意见并非能够得到另一个村小组认同,聚焦问题讨论时,也因利益差异而难以形成共识,甚至在劳动投入环节也容易出现“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小规模集体所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挑战基本一致,拥有共同境遇也容易产生共鸣,对于问题发现更加聚焦,也更容易协商共识,人们认同感更强,更愿意通过参与劳动解决问题。政府应该重视自然村的组织建设,实现组织向村小组下沉。

最后,劳动赋予行动主体开放视角。拉图尔说:“行动者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我们则需要向他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做了什么,也要知道他们怎样以及为什么做了哪些事情”^[34],案例村所经历并非“落后—发展”“无序—有序”的单一指向,白露村环境治理过程充满利益相关主体关联博弈,环境治理有关各种因素不断遵循着一个发展主题进行流动,彼此或者汇聚或者冲突,截取每一个片段都不能还原纯粹本质。这种复杂的脉络化是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劳动而投射积淀到农村房屋、水塘、道路、树木、古迹之上,营造出参差错落、多元有序的乡村景观。正如 Halfacree 在列斐伏尔脉络上提出“主体性视角”的乡村解读认为,主体性对于理解乡村非常关键,人们只有通过村民主体性视角才能真正理解乡村空间^[35]。这种错落化、层次化的景致效果无法通过商业化一次性打造实现,只有将村庄充分开放给村民个体,开放给实践中的人,开放给每一个愿意在自然中投入劳动的人,这种充满复合“共同性”却别具个性化的景致才可能获得。

四、结 语

本文根据“行动者—机制—环境”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村民是乡村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的主体,脱离村民的治理无法完成乡村振兴的目标,村民主体性集中体现在自觉的“劳动实践”,劳动赋予了村民主体地位,也保障了村庄美好环境的可持续。其次,农村环境治理必须要建立可靠的组织机制,涣散的个体无法成为主体,也无法保障劳动的价值转化,必须通过组织机制建设使分散农民集中起来,劳动在机制中得到持续正反馈,才能规避各种可能瓦解村民主体性的风险。再次,环境治理目标持续聚焦,围绕环境主题链接可以不断引入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的再生产,景观不断被赋予社会内涵,这才使乡村“自然空间”投射着“情感期待”,真正能托载起振兴期望,同时又能寄托乡愁。

“村民参与农村环境建设”本质指向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农村作为“共同体”是否可能的话题。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分析中国农村地方治理的资源,分别为政府“再分配”的“公”资源,市场“交换”的“私”资源和社区“互惠”的“共”资源,并强调社区资源应该是基层组织实现治理的根本^[36]。环境

必须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以共同体为单位的实践才能使“美丽乡村”承载其丰富内涵。在小规模村落共同体中,人们之间关系由地缘、血缘、姻缘交叠而成,拥有丰富的共同资源,本身具有互惠性质。“守望相助”是互惠的最经典体现,也是“劳动”最具有意义的部分,劳动既是推动共同体建设的条件,也是共同体资源富足的自然表达。“劳动”不断滋养着共同体中每一个人,使共同体持续拥有“共”的精神不竭,为农村实现和谐善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等.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发达地区J村养殖污染为个案[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4):101-112.
- [2] 梁流涛,翟彬.农户行为层面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进展与述评[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1):72-80.
- [3] 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新时期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3):133-137.
- [4] 黄森慰,唐丹,郑逸芳.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7(3):55-60.
- [5] 张诚,刘祖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7.
- [6] 周雪光.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J].社会发展研究,2015,2(1):182-208.
- [7] 冯仕政.从国家视角看乡村治理[N].新华日报,2016-2-19(14).
- [8] 张京祥,陈浩.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J].城市规划,2014,38(11):9-15.
- [9] 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J].社会学研究,2021,36(1):46-68.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ORTNER S.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acting subject[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HOLBRAAD M, PEDERSEN M A.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 [13] INGOLD T. 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C]//STRATHERN M. Shifting contexts: transformations i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95.
- [14] INGOLD 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5] 朱晓阳. 小村故事: 地志与家园(2003—2009)[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6]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 [17] WOOLGAR S, JAVIRE L. The wrong bin bag: a turn to ontolog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3, 43(3): 321-340.
- [18]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9] MURDOCH J. 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 407-419.
- [20] 李承嘉. 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乡村发展之研究: 以九份聚落 1895—1945 年发展为例[J]. 台湾地理学报, 2005(39): 1-30.
- [21] PAUL R. 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 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09-164.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3] POVINELLI A. Radical worlds: the anthropology of incommensurability and inconceivabilit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1(30): 319-334.
- [24] 周晓虹. 2003: 中国社会学学术前沿报告[J]. 社会学研究, 2004(2): 1-24.
- [25] 卢晖临,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 118-130.
- [26] 毕静. 罗田县三里畈镇苍霞冲: 共同缔造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EB/OL]. (2022-08-06)[2022-10-06]. http://www.luotian.gov.cn/art/2022/8/6/art_20366_1657761.html.
- [27] 汪光焘. 搞好村庄规划和治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J]. 求是, 2006(9): 26-28.
- [28]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02-210.
- [29] 贺雪峰,桂华. 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J]. 开放时代, 2022(4): 51-61.
- [30] 欧阳静. 简约治理: 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3): 145-163.
- [31]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 (2021-02-22)[2022-10-06]. 新华社, 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222/t20210222_525418163.shtml.
- [32] 尤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篇[M]. 郭官义,李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29.
- [33]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5: 2, 64-74.
- [34] LAW J, MALDEN H.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M]. Mass: Blackwell, 1997: 17.

- [35] KEITH H, HALFACREE. Talking about rural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 as expressed by residents of six English parish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5, 11(1): 1-20.
- [36] 田原史起.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 关系、团结、三农政治[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Return to Labor: The Simultaneous Practice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MA Wei

Abstract With the premise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Local governments promote rur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from top to bottom and implement pro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s such as hardening, brightening and beautification, which have greatly improved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many place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t the same time, some new problems have emerged. For example,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work in some areas is detached from the life of residents, the landscape and life are separated, the rural residents are not organized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the subjectivity is weakened,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will of rural residents to transform and their own mobility are marginalized. The “ontology turn” of Marxist anthropolog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labor”, believing that only an environment that incorporates labor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nature to “landscape” and make it more livab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or network,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mutually subjective and embedded in each other.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inity of people-labor-landscape, we present a case study of the action proces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rom self-consciousness to self-action arou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cluding organizing labor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ssociations to stimulat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uilding a labor-base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s to ensure that villagers get paid for their work and make labor participation sustainable. In addi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akes residents as the main part, brings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residents, organizations and landscapes into the network of governance tasks, and all subjects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so that multiple parties rely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ions to achieve multiple goals. To stimulate their main activities through labor mobilization, rural residents are transformed from “object” to “subject” and from “edge” to “center” in the renovation work, and a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is built.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we can realiz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ies and nature, with labor as the link, bring into play the value of people as the key factor of productivity, and achieve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labor practic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village organizations; network of actors theory

(责任编辑: 陈万红)